

民间体育故事的记忆载体、社会价值与传承路径

——以戚继光藤牌抗倭故事为例

廖建媚¹, 陈萍²

(1. 厦门理工学院体育部, 福建 厦门 361024; 2. 宁德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福建 宁德 352106)

摘要:文章借助文化记忆理论,运用田野访谈法和口述史方法,系统研究了福建平潭戚继光藤牌抗倭故事的历史记忆。研究结果显示:故事的记忆载体有文字、民俗和空间象征形象;故事的社会价值为保境安民的时代需要、传统英雄的模仿崇拜、地域族群的身份认同和强身健体的必备手段;故事的传承路径包括标志空间的重构、非遗保护的促进、传播媒介的融合和文化品牌的打造。研究期望为我国民间体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实践与创新提供案例经验、思路与决策参考。

关键词:民间体育故事;记忆载体;社会价值;传承路径

中图分类号:G 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22)04-0017-05

Memory Carrier, Social Value and Inheritance Path of Folk Sports Stories

——Research on Teng Pai Exercise and Qi Jiguang's Anti-Japanese Pirates

LIAO Jian-mei¹, CHEN Ping²

(1. Sports Department of XMUT, Xiamen 361024, China;

2. Sports Institute of NDNU, Ningde 3521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field interview method and oral history metho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Qi Jiguang's anti-Japanese stories in Pingtan, Fuji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mory carriers of stories are characters, folk customs and spatial symbolic images. The social value of the story is the need of The Time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people, the imitation and worship of traditional heroes, the identity of regional ethnic groups and the necessary means to keep fit. The inheritance path of stories includ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symbol space, the promo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integration of media and the building of cultural brands.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case experience, ideas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folk sports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Key words: folk sports stories; memory carrier; social value; inheritance path

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许多社会活动为了强调某些集体记忆^[1],常常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两种方式来维持和传递^[2],以强化某一人群组合的凝聚。在华夏五千年文明中,使人民自豪的不只是丰富的“历史文献”,更应该是各地人群长期交流、交锋下产生的以各种媒介所表达的“历史记忆”,包括被视

为“民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那些记忆。^[3]这些历史记忆在表层叙述体制上,呈现模式化的民间叙事特征,在深层文化背景上,体现出民俗信仰、人民观念等复杂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乡土社会仪式中身体运动展演所具有的保持历史记忆、传递记忆功能和强化族群认同的作用^[4],郑成功驱荷复台及寓兵于农在广大人民中所形成的历史记忆与所形塑的历史心

收稿日期:2022-03-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8YJC890002);宁德师范学院校级专项资助计划科研项目;闽东民间体育故事研究(2021ZX204)

作者简介:廖建媚(1979—),女,福建顺昌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陈萍(1982—),男,福建龙岩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通信作者)

性^[5],海峡两岸宋江阵参与者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在其身体展演和故事叙事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元化认同观^[6-7],都体现了历史记忆和英雄传奇故事的渗透与影响。纵观国内外文献,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对于记忆与认同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身体运动展演能够形成集体记忆和历史心性的观点虽已被学界认可,但针对体育叙事学领域涉猎相对较少,从微观记忆视角结合口述史的研究更少。

近年来,中国日益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化人民对文化的“记忆”和文化的“传承”,以促进“身份认同”,助力国家与民族的团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8]民间体育故事是劳动人民创造并广泛传播的与体育有关的民间文化记忆,这些故事作为古今中外教化世人的重要教育文本,可以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传播中国智慧。但是,目前相关研究不多,本文以戚继光藤牌抗倭故事为研究对象,阐述民间体育故事的文化表征、传承机制和传播路径,对于弘扬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广大青少年了解历史,培养其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期望为后续民间体育的保护、传播及发展提供案例参考。

1 民间体育故事的形成基础

平潭简称“岚”,地处福建东部海域,因其位置的特殊性,在交通和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历代朝廷所重视的海防战略要地。明嘉靖年间,福建倭患严重,戚继光奉命率精兵入闽抗倭,先后至宁德横屿岛、福清牛田、莆田林墩,斩倭数千人,捣毁福建三大倭巢。^[9]²⁶⁶“藤牌操”也称“藤牌舞”^[10],素有“中国第一军事体操”之称,是平潭海防史的见证者之一。关于藤牌操的起源,根据现存文字记载和坊间传闻,普遍认为是戚继光当年在福建和浙江沿海一带抗击倭寇,用藤牌以名为“鸳鸯阵”的阵法训练“藤牌军”所创。后来,这种军事训练手段和戚继光藤牌抗倭故事在平潭民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人民强身健体、娱乐表演的一种方式。

2 民间体育故事的记忆载体

福建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戚继光“藤牌军”抗倭

的记忆。记忆是构成人们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1]经由记忆构建的身份认同是集体得以存在的基础,这也是文化记忆的一种重要表征形式。^[12]文字、民俗和空间象征形象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和物质载体,它们既是文化记忆的保存方式,又对社会记忆的形式产生深刻的影响。戚继光藤牌抗倭故事正是通过上述三种载体“记忆文化”,延续地域、族群和国家记忆,形塑人民文化认同,下文从上述三个维度进行具体论述。

2.1 文字

文字反映着人们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情感体验、价值取向^[13],为记忆提供“数据库”存储空间,方便记忆的提取和保存。福建民间有许多颂扬戚继光藤牌抗倭的童谣和诗歌。童谣“戚我爷,戚我爷。爷未来兮民咨嗟,爷既来兮,凶妖荡尽,草木生芽。欲报之德,昊天无涯。愿爷孙子兮,为公为公,永定国家”^[14]¹¹⁴;“月光光,唱西塘,骑杉马,过杉塘,杉塘水深飞过渡,将军姓戚名继光。身骑大马背大刀,率领三军守海疆,海贼打个死翘翘,戚将军威名四海扬”。^[15]古诗“生我兮父母,长我兮疆土。生我不辰兮,疆土多故;莫我再生兮,维戚元辅。于皇元辅兮,允文允武;繄我今日兮,汉仪复睹”^[14]¹¹¹;“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至于今,遗饼纪征东,民怀切。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教秦灭...”^[16]¹⁵⁵。这些诗词歌赋概括了戚继光东征西讨的战斗生活,暗喻其抗倭斗争的艰难困苦,表现了戚继光抗倭报国的赤诚丹心和丰功伟绩,表达了人民对他的高度认可与赞扬。

2.2 民间习俗

民间习俗为记忆提供了物质化的延伸,传递着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方式和认同标准。福建民间从明代至今保留着一些习俗,与当时戚继光在福建东南抗倭有密切的历史渊源。相传为支援戚家军连续作战,使北方将士克服水土不服问题,平潭和福清人民对戚家军干粮山东烧饼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改良,并用细绳结扎成串便于行军携带,这就是福清名小吃“光饼”的雏形。后来,福建民间为纪念戚继光抗倭之功,将这种烧饼命名为“光饼”。“光饼”不仅寄寓着福建人民对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无限景仰,是福建人民拥军支前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而且已经成为福建的乡土标志,体现了人民的爱国、信仰与乡愁。

2.3 空间象征形象

空间象征形象是文化记忆的物质化载体,代表着一个群体对待世界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民间故事具有传播的地域性,它们的发生与空间场所密切相关,在地域内部流传的过程中和地域空间产生各种联系,形成空间记忆。一方面是与物质实体如刻碑、庙宇、雕塑等发生关系,这些实体就是民间故事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形成“实体化”的记忆载体;另一方面则是与空间的文化符号互相影响,主要是将故事中的情节、人物等与该区域的地名联系起来。^[17]这些物质实体或文化符号都属于文化记忆的象征形象。关于“戚继光藤牌抗倭”故事中流传下来的历史遗迹、地名等空间象征形象很多。福州于山顶、莆田林墩、平潭、福清境内均建有戚公祠,另建有戚继光纪念馆、陈列馆。以勒石或塑像的形式纪念和传扬戚继光的英雄事迹。^{[16][71]}泉州惠安为他树碑立传、建有“崇武古城”,褒奖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荡平倭患。福建百姓把与“戚继光藤牌抗倭”有关的街、路、井等,以戚继光的名字命名,此外,宁德樟湾村、莆田黄石镇^{[16][157]}和福清瑞岩山上等留有多处戚公井。

3 民间体育故事的社会价值

记忆与认同相生相伴。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18]。

3.1 保境安民的时代需要

民国时期的平潭潭城镇下辖大路顶庄、右营、江仔口和后围几个自然村。大路顶庄当时分为上大路顶和下大路顶两部分,共有七百多户居民,其中尤以蒋氏、林氏、李氏、陈氏族群人丁兴旺,实力雄厚。不同宗族之间常有因争夺地方资源而发生冲突的情况。据田野调查获悉,平潭藤牌操基本上以家族世袭、言传身教、师徒传承为主要传播形式。近年来由于传承困境,逐渐打破“世袭传承”“传内不传外”和“传男不传女”的门规约束,传授给外族人和女性。虽然传习藤牌操的人随着社会变迁不断改变,但关于藤牌操的记忆和认同却从未改变。藤牌操对于一代代传习人的首要意义在于家族结构扩展的根基性认同情感,利用武术身体展演记忆凝聚族群,并加以巩固和维持族群的边界线^[17]。下面这段采访稿可做佐证。

“原先我们不叫平潭藤牌操,原先藤牌操还没有

推出去,叫大路顶藤牌操,我的外太祖(陈锦和),拳术非常好,在拳术基础上由他们发展下来的。原先乡村之间有械斗,乡和乡之间为了争土地或资源,就有械斗。原先旧社会时候,不想让他们(外乡人)侵犯到我们乡村的利益,我的外太祖组织了一个比较有规矩、有规模的小团队,就是这个藤牌操团队。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搬运工,白天一起干活,晚上一起学藤牌操,为了保护家里面和乡村的利益,增强本领和能力。”藤牌操第四代传人 HSH(1949年生,平潭大路顶人)。

3.2 传统英雄的模仿崇拜

中华民族尚武崇德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古代的英雄形象中表现最为明显,英雄话题是历史亘古不变的主旋律,如秦朝著名将领蒙恬、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以及本文研究的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等。这些英雄形象都体现出抑强扶弱、济困扶危、见义勇为,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历史场景。他们除了有非凡的身体素质和高强的武艺外,还有常人所无法企及的高尚情操和道德品行,能够完美地展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藤牌操作为特殊的武术身体展演形式,能够流传至今,除了具有英雄形象的闪光点外,也凝结着当地人民的英雄崇拜情结。如下文所示。

“藤牌操有一种侠义精神:不是死敌不亮牌,不逢喜庆不亮相。平潭人特别勇敢,崇拜戚继光,它承载着保家卫国、英雄无畏的正能量,奠定了藤牌操的基础,这个基础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后来的藤牌操。”NJS(1961年生,旅日学者、平潭作协副主席)。

3.3 地域族群的身份认同

文化记忆最重要的作用是建立人们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又可分为内在和外任两类。内在的身份认同是人们作为藤牌操传承者的“自我认同”,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外在认同是经由外力作用促进的认同文化,它将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现代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自我存在的忧虑,需要依靠在社会中树立独特的个性或独自承担责任来生存^[12]。人们迫切希望通过藤牌操寻求“共同体”,获得安全感,“身份认同”此时便被适时地唤醒和激发出来。戚继光这一光辉的正能量形象,总是被历朝历代国家和政府层面反复提及和推广。平潭人民通过藤牌操结合戚继光英雄形象,将族群凝结在一起,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祭祀活动和宗教信仰,并在各个社会阶段不断地传承、改编、演变与发展,构建了社会文明所不可缺少的

精神,正是对于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力证。如下文传人采访所示。

“身边许多朋友看完藤牌操表演后,慕名前来拜师学艺的人络绎不绝。”“藤牌操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一定要守好。我期待着能有更多人将它学精学透,传承下去。”藤牌操第五代传人 CWY(1965 年生,平潭人,装修公司经理)。

“平潭藤牌操,历经 450 多年的风雨沧桑,承载着戚继光等许多志士仁人保疆卫土、追求光明、捍卫和平的风采品格;承载着海坛英雄儿女,不畏强暴,英勇御敌,奋发有为的精神情操。”藤牌操第四代传人 LWL(1952 年生,平潭人,退休公务员)。

3.4 强身健体的必备手段

时代背景赋予了藤牌操不同的社会功能和特殊价值,但其强身健体的功能却始终居于重要的位置。明代抗倭,戚继光将藤牌操作为强健士兵的体魄、提高军队战斗能力的训练手段。郑成功抗击荷兰人,使用藤牌操作为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抵御外敌作战能力的重要训练科目。清朝詹殿擢将藤牌操改编成以战阵格斗为核心,以近身缠斗与强身健体为主要目的的训练手段。20 世纪 20 年代,平潭地区瘟疫横行,以武术南拳动作作为主要内容的藤牌操成为人们达到“驱邪祛疫,强身健体”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改善,藤牌操逐渐演变为具有健身、娱乐和表演功能的体育项目,成为人们闲暇时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近年来,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和社会大众的观赏需求,藤牌操已成为一项融武术、技击、体操、舞蹈为一体的民间展演艺术。下文是藤牌操传人的切身感受。

“自我 1984 年学习藤牌操至今,已经有 36 年了。藤牌操所传递的民族英雄自豪感、海坛文化历史感,是我最感动的”,“藤牌操所带来的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进步,是我最大的收获与感动。”藤牌操的第五代传人 LCL(1967 年生,平潭潭城镇人,金融业)。在 LCL 看来,藤牌操是对戚继光抗倭精神和平潭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可与激励。多年来他习练藤牌操从不间断,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每当拿起藤牌与刀枪,就浑身充满了劲,一套动作下来更是心情舒畅。

4 民间体育故事的传承路径

德国学者 Jan Assmann 认为文化记忆是每个群体、每个社会特有的一套可重复使用的信息范本,通

过旧信息的继承和新信息的整合达成对信息范本的“维护”后,这个社会或群体能巩固并延续自身发展^[19],认为文化记忆具有重构性、延续性和强化性特征。下文以此为基础,着重揭示民间社会群体对戚继光藤牌抗倭故事的当代重塑和延续行为。

4.1 标志空间的重构

近代平潭藤牌操的摇篮和承载着民间信仰记忆场所的福兴寺综合庙宇群,分别供奉着戚继光等 106 尊神像。该庙宇群始建于北宋太平年间,明嘉靖年间毁于倭患,经清代及民国的数次修缮,成为平潭县寺庙之冠,俗称“福兴正境”。自其问世以来,福兴寺是大路顶庄人陈锦和与蒋松舫开设武馆、收徒传授藤牌操之地,成为近代藤牌操传播中华文化的摇篮。福兴寺还是当地人民和海外华人宗教信仰、许愿祈福的首选之地。解放初期,福兴寺被拆除改造,以蒋心华为首的藤牌操传人分别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2006 年、2012 年、2016 年、2020 年多次向当地民宗局请愿,要求恢复重建福兴寺等综合庙宇群,重建藤牌操传人的“精神家园”。个体记忆的唤醒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体育物件及空间的诠释,从而使参观者产生积极的归属感,并在引起个体记忆的同时,引发个体对族群、地方乃至国家的文化认同。^[20]法国学者巴什拉曾将空间记忆理解为存在的“家园”,即作为存在现实化的“在世”。^[21]福兴寺这一精神家园使藤牌操的存在具有了现实的归属感,同时给予藤牌操传人心灵的归属感。对广大藤牌操传人来说,福兴寺是给他们心灵庇护和归宿的意向空间,是随着人迁移漂泊的记忆空间。他们屡次联名申请恢复重建福兴寺的目的,其实在于促进藤牌操文化记忆在空间迁移中留驻、活化与再生。

4.2 非遗保护的促进

解放初期,藤牌操“摇篮”福兴寺旧址被拆除,失去“大本营”的藤牌操传人将徒弟分散到师傅自家宅院训练,但因宅院空间狭小、训练受限,后辗转到村镇牛棚和废弃的燃料公司训练,传习效果十分有限。2011 年,平潭综合试验区成立,为藤牌操带来了新的生机,以 JXH、HSH 为核心的藤牌操传人和 NJS、LWL 等乡土文化精英商议决定组建藤牌操协会,健全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在多方筹谋和不懈努力下,2012 年平潭藤牌操协会正式注册成立。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藤牌操,传人们勤耕不辍,走上了艰辛的非遗申报之路。2017 年 11 月,平潭藤牌操入选为福建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 17

人被认定为区级传承人。自此,藤牌操迎来了重焕光辉的时代。2018年7月,藤牌操基地正式落成,分散各地的藤牌操传人有了固定的学习、交流和展演藤牌操的场所。此后,藤牌操协会陆续走进中小学课堂和当地军营传承技艺,承接各种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公益和商演活动,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4.3 传播媒介的融合

现代传媒在文化记忆的重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总会积极主动地对记忆进行呈现和表征。近代以来,藤牌操传人组稿撰写的一系列著作——《藤牌操传》《藤牌操志》《藤牌操史话》等通过纸媒介再现了戚继光藤牌抗倭的历史记忆,也再现了平潭藤牌操薪火相传的历史故事。除此以外,各种传统媒介对藤牌操技艺、记忆和文化进行宣传、报道和推广。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小刀会》,使藤牌操技艺通过影视屏幕进入人民视野。2008年,平潭藤牌操入选为福州市非遗代表性项目,打开了通向外界的一扇窗户。2009年央视《走遍中国》及2012年央视《新春中国行》栏目直播藤牌操表演,对戚继光藤牌抗倭故事进行了深度推介。当地《平潭时报》多次对其进行了宣传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体给文化记忆提供了开放性、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渠道,抖音、快手、微视等新媒体为藤牌操的传播打破了时空界限,进入了全新的“延伸场景”式融媒体发展时代。藤牌操传人在新时代孕育了新理念和新创想……

“我准备通过文创,通过动漫业平台把藤牌操的文化元素营销出去。融媒体时代,不管什么时代到来都不能离开历史,都要还原历史,都要客观对待历史……”“既然叫融媒体,它必须有三个基本的底盘,第一个他必须有文字底盘,需要纸媒;第二个必须有视觉传媒,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电脑,或者是360搜索引擎,在网络上建立平台,有视听平台和大数据等;第三个关键的是文创团队,文创包括了动漫、抖音、短视频、绘本,要传播更大的范围……”NJS说。

4.4 文化品牌的打造

2011年11月,国务院批准《平潭综合试验区总体规划》发布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平潭综合试验区开放、开发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特殊地位,标志着平潭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对平潭乃至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和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平潭市政府利用文化综合识别体系效应,将藤牌操作为一项特色文化资源,发挥其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一体化实践和人文理念与当地文化产生共鸣并延续记忆。正如提到中国,外国人民就能联想到长城、汉字、京剧、中医养生等这些象征中华民族的图腾或符号。第一,平潭开发区首先重视与扶持藤牌操技艺这一非遗项目,激发当地人民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使其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参与。第二,塑造藤牌操的体育品牌效应,通过非遗平台提升城市知名度,加强地域文化辨识度,以此来宣传和吸引游客。第三,根据自然地理特点,以藤牌操为媒介,开发体育文旅产品,为闽台两岸文化交流搭建平台,为国际旅游岛建设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跨区域文化交流。

5 结语

戚继光藤牌抗倭故事得以延续的文化根基是福建平潭当地人民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和体育价值的重构。掌握历史记忆的主体、文化认同形成的路径以及选择不同时代语境中的记忆对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至关重要。每一位有记忆能力的中国公民都是历史记忆的主体,民间体育故事的延续有赖于历史记忆的有效支撑和现代重构。

参考文献

- [1] LEWIS A. Coser, “Introduction; maurice halbwachs,” in on collective memory [M]. ed. & 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Maurice Halbwachs,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 (Paris: Pres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2).
- [2]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 [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0.
- [3] 王明珂.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
- [4] 郭学松, 王伯余, 杨海晨, 等. 仪式、记忆与认同: “三公下水操”中的身体运动研究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7, 43(6): 52-57, 72.
- [5] 张华, 郭学松. 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郑成功在民间武术组织中的认同与形塑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6(3): 92-97.
- [6] 郭学松. 记忆、认同与共同体: 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中民族传统体育身体展演与话语叙事 [J]. 体育科学, 2020, 40(7): 79-87.

(下转第36页)

为纽带,融入东南亚华人社会,推动中华文化在当地的发展,通过华侨华人武术讲好中国故事,鼓励国内各级各类武术社团及侨团组队参加新加坡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武术赛事,也欢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武术社团组织来华交流、访问与合作。

注释:①②③④⑤选自新加坡全国国术总会内部刊物《新加坡华族武术史话》(1990),刊物由梁君夷主编。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 (2017-01-25)[2021-04-07].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 [2]中国武术协会. 关于印发《体育总局武术中心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实施方案》的函[EB/OL]. (2020-03-20)[2022-04-07]. <http://www.wushu.com.cn/#/inform/informDetail?id=743>.
- [3]王大海. 海岛逸志[M]. 香港:学津书店,1992:64-65.
- [4]颜清湟. 新马华人社会史[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265-277.
- [5]李金萍. 二战后新加坡华族会馆的变迁、原因及未来的发展趋势[J]. 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3):102-107.
- [6]曾玲. 社会变迁、国家因素与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宗乡文化之复兴[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65-69.
- [7]李杰. 新加坡武术龙狮总会秘书长:希望武术早日进入奥运会[EB/OL]. (2010-10-21)[2021-04-07]. <https://sports.sina.cn/sa/2010-10-21/detail-ikftpnny7961004.d.html>.
- [8]黄振鹏. 全球化背景下海外华人传统体育的文化乡愁[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8(6):42-45.
- [9]涂孝忠. 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及其走向[J]. 文史杂志,1995(5):32-33.
- [10]揭光泽,付爱丽. 武术文化通过华侨华人进行国际传播的历史沿革[J]. 体育学刊,2015(4):135-138.
- [11]文明华,隋文杰,肖洪波. 全球华文教育视角下中国武术国际化推广研究[J]. 体育科学研究,2013(12):1-5.
- [12]肖建忠,谭华. 华侨华人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2012(7):114-116.
- [13]王伯余,郭学松,赵少聪. “故事”何以讲述?——民族传统体育宋江阵演武叙事[J]. 体育与科学,2021,42(3):76-81,105.
- [14]新华网. 权威发布:十九大报告全文[EB/OL]. (2018-03-13)[2020-10-10]. <http://sh.people.com.cn/n2/2018/0313/c134768-31338145.html>.
- [15]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有多真实?[M]. 季斌,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7.
- [16]全晰纲,马继业. 抗倭名将戚继光[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71,155,157.
- [17]罗彩娟,梁莹. 记忆、象征与认同——靖西壮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53.
- [18]郑晓云. 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
- [19]ASSMANN J, CZAPLICKA J.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J]. New German Critique, 1995(65):125-133.
- [20]刘强,杨海晨. 物件、空间、记忆与文化认同:国内外体育博物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体育科学,2020,40(5):32-41.
- [21]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
- [22]谢红萍. 文化交流视域下民间叙事的本土实践——读《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J]. 民间文化论坛,2016(6):119-124.

[责任编辑 江国平]

[责任编辑 江国平]